

# 教育与经济发展

## ——兼谈我国教育经费的有关问题

### 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ISSUES ABOUT CHINA'S EDUCATIONAL APPROPRIATION

欧阳钟辉

#### 世界性经济规律显示， 教育水平与公民收入、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成正相关关系

据1986年4月11日《人民日报》载，在一次对28个省、区、市的262个村庄和36 667个农户所作的调查中，以家庭成员的最高文化程度作比较，1984年中国农村的人均纯收入，文盲户为284元，小学程度户为385元，初中程度户为466元，高中程度户为556元，大专程度户为756元。大专文化程度户的人均收入为文盲户的2.6倍。

上述这些因教育水平高低导致个人、家庭收入差异的规律，在世界各国是普遍存在的，在不同教育程度的人的年龄—收入二维图上呈一种规律分布，教育经济学称之为“年龄—收入剖面图”(age-earnings profile)(图1)。

这种教育水平与个人、家庭收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反映在国家和社会的大群体中。用适龄人口入学率对比各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则可明显看出：若以各对比国的小学适龄人口入学率均接近100%为前提，一个国家的人均GNP与这个国家的中、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入学率紧密正相关。

中国人均GNP被列为世界六大经济发展类别的倒数第二类，一个明显的原因就是我国的中、高等学校适龄人口入学率低于其他国家。

事实证明，无论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还是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人民教育程度高低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个人、家庭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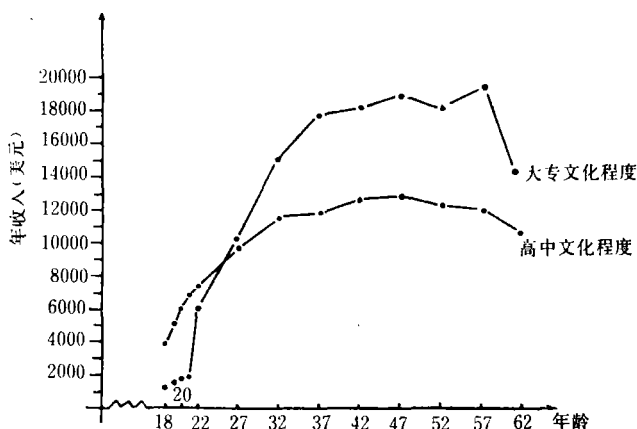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教育程度的美国白人男子年龄

—收入剖面图 (1973)

#### 人力资源的作用在发展中国 家的实际政策中仍遭忽视

尽管教育与经济发展有着普遍的内在联系，但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开始并不为各国政府和经济学界所承认。

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及其经济学代表认定资本是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在他们看来，没有资本，经济就不能发展，社会就不能进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劳动和劳动力在资本积累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这个理论不仅推动了近代的无产阶级革命，而且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劳动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

因素。从马克思开始,经济学家还承认有技术的劳动力和无技术的劳动力在推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明显差别。为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近代各个国家一直在努力培养本国人民,使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

然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时,大多数仍强调资本、自然资源、外国援助和国际贸易的作用,而忽略人力资源的作用。不少发展中国家接受他们的观点和采用相应的战略,在一个时期里经济上确实取得相当程度的发展。但当贸易不平衡发生,靠出卖资源维持繁荣的国家遇到原材料价格猛跌等不利因素时,这些国家就负债累累,有的甚至丧失还息能力。据资料(R. E. Feinberg, 1984)显示,仅1983年发展中国家应转移归还发达国家的贷款利息高达520亿美元,发达国家答应其中200亿美元作为新贷款,该年发展中国家尚欠息320亿美元。

### 什么是发展经济的有效战略? 是人力资源开发,主要就是教育

早在1964年,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弗雷德里克·哈比森(Frederick Harbison)和麻省理工学院工业关系教授查尔斯·A·迈尔斯(Charles A. Myers)领导的一项研究揭示,在14项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间关系的指标中,与人均GNP相关系数最大的是下述几项指标:人力资源开发指数(这是一项区别各国人口教育水平高低的综合指标)(0.888)、每万人口中工程师和科学家的人数(0.833)、中学适龄人口入学率(0.817)、每万人口中教师数(0.755)、大学适龄人口入学率(0.735)、小学和中学适龄人口入学率(0.732)、每万人口中医生数和牙医数(0.700)和小学适龄人口入学率(0.668)。指标数中的小学适龄人口入学率虽然序号较低,但并不意味着小学教育不重要,因为最高序号的综合指标及较高序号的中学适龄人口入学率均以小学教育为基础。其序号低可能意味着这个研究方法揭示的是易于生效的方面。研究者的结论是:“人力资源开发是社会上所有人的知识、技术和智能增长的过程。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它可被描述为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中的有效投资”。哈比森和迈尔斯的著作直到80年代还被广为引用,现在的学者继续确认人力资源开发(教育)是现代化的关键。对这个结论尚持怀疑态度或半信半疑的人——特别是决策人,只要从美国、日本一些大企业集团继续投入大量金钱以培养他们的职工、工程技术人员、新工人的例子,不难得到确证。因为,资本家

每投入1美元的资本,事先都已考虑到回收资本,取得利润的可能性。人力资源开发如果无利可图,他们是不会这样持续不断地投入比例越来越高的资本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仅要考虑到人力资源开发,即发展教育对实现物质文明的作用,还要考虑到教育在创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振兴中华方面所具有的巨大的长远的作用。

### 教育同时也有依赖经济发展的一面

只要我们客观地从各个角度去观察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就应当承认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也就是说,人口的教育程度高可以促进经济的更快发展;反过来一个发达的国民经济又可以为推动教育事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如果经济基础薄弱,硬要发展过高比例的教育事业,那么这种教育事业也是很脆弱的。

二次世界大战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结束了它们屈辱的殖民地历史。独立后,这些国家大力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以清除殖民影响,并培养自己的民族精英(elite)——国家建设的栋梁。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73年和1979年的统计资料,这些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当时的日本)各级各类学校入学总人数在50年代均比殖民地年代翻了一番,60年代比50年增加了80%,70年代比60年代又增加了近一倍。即使扣除其中高人口增长率的影响,仍反映出50年代到70年代整个第三世界广大贫苦百姓和他们的子女得到了殖民地时代难以得到的受教育的权利。

由于经济基础较弱,第三世界国家在高速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方面也确有困难的一面。首先,由于高速发展中、小学教育,出现了教师短缺的现象。这种短缺不仅包括数量,还包括质量。其次,这些国家普遍存在教育经费不足,结果是,减慢教育发展速度或提高学生入学费用;后者使得私立学校入学人数减少,而收费低廉或基本免费的公立学校人数增多。第三,较高的辍学率和留级率影响了教育投资效益和教育质量,因为贫穷家庭往往难以维持他们子女的正常学习。国际教育成就检查协会(IEA)对23个发展中国家中、小学生测试的资料也显示,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文化知识水平比较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同级学生要低。第四,随着发展中国家50年代、60年代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一个高教育程度群体的失业问题也突出出来了,国家无法给这些毕业生提供这么多合适的工作机会。在这方面,较为幸运的是南朝鲜。他们在50年代后期也存在一大批这类

“毕业即失业”的大学毕业生,但由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到了70年代他们反而感到高教育程度的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短缺。

## 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对比,我国尚未达到教育与国民经济的“最佳匹配”水平

认识到教育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又注意到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问题,那么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就是:在我国,什么样的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可成为“最佳匹配”。所谓“最佳”可以定义为,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国家的教育事业发展到了它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而国民经济又从这种教育程度上获得了它所可能获得的最佳人力资源,从而在现在水平上达到国民经济的更快发展。

我们可以沿上述定义的思路,来对比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而考察我国教育事业是否在目前的经济水平上达到了应该达到的较好水平;如果在某些方面没有达到,那么有哪些途径可供选择 and 采用。据可比资料,我国与发达国家,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差距是较大的。据世界银行1985年世界发展报告的材料,1983年我国人均GNP为300美元,不到埃及的一半,不到巴西和南朝鲜的1/6,不到新加坡的1/22,不到日本的1/33,是美国的1/47。造成这个差异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一个明显的、现实的直接关系是中、高等学校适龄人口入学率较低。显然,要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必须进一步提高我国现在的中、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入学率。

这个问题牵涉到如何筹集更多的教育资金和如何充分利用这些资金两个方面。

首先,我国是否已提供了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教育资金?如果没有,是否有其他补充办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把发展教育与科技作为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四大战略重点之一,这是个很英明的决策。为实现这个决策,党和政府已尽了很大努力,使教育经费每年以较大的比例增长。教育经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已从50年代的百分之五点几上升到80年代的10%左右。这种努力在推动教育与科技的发展,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方面已取得很大成效。但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家底穷,历年欠账多,目前教育经费的分配、安排实际上尚未达到本应达到的水平,即与我国实际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水平。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1年统计年报报道,

以平均值而言,人均GNP低于200美元的国家当年教育拨款占其GNP总额的3.3%,300~500美元档的占4.2%,500~1 000美元档的占4.4%,

1 000~2 000美元和2 000~5 000美元档的占4.5%,5 000美元以上档的占5.8%。尽管我国以前的统计资料中“工农业总产值”与世界上通用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在概念和计算内容上还有差异,但经过换算,我国70年代到80年代前期的教育费用均未超过我国当年国民生产总值2%的水平(见表1、图2),根据世界银行最新资料,1983年也仅为2.2%。而我国人均GNP在1983年是300美元。这不仅不能与国民生产总值同档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费用与GNP总数比值相比,而且还低于下一档发展中国家的同一比值。

## 除了继续提高由中央政府直接拨款的教育经费比例外,教育经费的多源化是提高教育投资的重要途径

当然,十年动乱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均需要国家拨款,扶持其振兴和发展。但是,这种长期存在的、对教育事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不成比例的拨款不能不是我国中、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困难之一。关键性问题还是在于:中、高等教育以至整个国民教育事业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并没有真正被认识到;问题之二是,尽管我国政府近几年来已增大了对教育的拨款比例,但由于我国的教育经费来源过于单一,主要是中央政府拨款,因此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教育经费不足,教师实际收入仍低于其他行业的局面。

目前,各个国家教育经费的来源及使用办法主要有下述四种类型。

第一,美国类型。从1955年到1977年美国总的教育经费约6~10%来自联邦政府(相当于我国的中央政府),28~35%来自各州政府(相当我国省、区、直辖市政府),28.5~42%来自地方(相当我国的市、县),22.4~26%来自其他(学生学费、学校经营收入、私人捐赠等)。美国公立中、小学和非公立中、小学在校学生人数之比约是8:1(以1976-1977学年为例)。公立中、小学经费主要来自各级政府,学生完全免费(包括学费、午餐、课本及交通)。非公立中、小学对学生收一定数量的学费,但学费收入占这类学校经费来源的比例并不高,他们的其他经费来源是非政府部门(教会、团体及私人)的捐助。有关高等学校经费来源的较新资料(1985年)表明,尽管联邦政府给大学的拨款50年代以来逐年增加(主要是用于研究和资助学生的费用),但到1985年为止也只占大学经费来源的23%左右。美国这种教育经费来源多样化

表1. 我国教育经费与工农业生产总值及国民生产总值比较表

(单位: 亿元)

| 年 代       | 1983     | 1984     | 1985     | 1986       | 1987     | 1988     | 1989     | 1990     |
|-----------|----------|----------|----------|------------|----------|----------|----------|----------|
| 文教经费      | 208.43*  | 221.02   | 234.82   | 251.49     | 269.18   | 287.95   | 307.86   | 328.40   |
| 教育经费      | 126.03*  | 132.94   | 140.97   | 152.43     | 163.26   | 175.86   | 189.52   | 203.74   |
| 教育/文教     | 60.47%   | 60.15%   | 60.03%   | 60.61%     | 60.65%   | 61.07%   | 61.56%   | 62.04%   |
| 高教经费      | 26.47%*  | 27.92%   | 29.60%   | 32.01%     | 34.28    | 36.93    | 39.80    | 42.79%   |
| 高教/教育     | 21%      | 21%      | 21%      | 21%        | 21%      | 21%      | 21%      | 21%      |
| 工农业总产值    | 11269.74 | 12425.29 | 13699.33 | 15104.00** | 16508.67 | 18043.98 | 19722.07 | 21556.22 |
| 教育/工农业总产值 | 1.12%    | 1.07%    | 1.03%    | 1.01%      | 0.99%    | 0.97%    | 0.96%    | 0.95%    |
| 国民生产总值    | 7351.83  | 7973.79  | 8648.36  | 9380.00**  | 10111.64 | 10900.35 | 11750.58 | 12667.12 |
| 教育/国民生产总值 | 1.71%    | 1.67%    | 1.63%    | 1.63%      | 1.61%    | 1.61%    | 1.61%    | 1.61%    |

\* 1983年的文教经费、教育经费及高教经费为实际值。资料来源: 陶增骈(主编),《高等教育行政管理》, 1984年4月沈阳其他年份的同类经费为推算值, 推算办法见同一资料来源。

\*\* 1986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为实际值。资料来源: 1987年2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报。其他年份总值亦为推算值, 按85/86的增长率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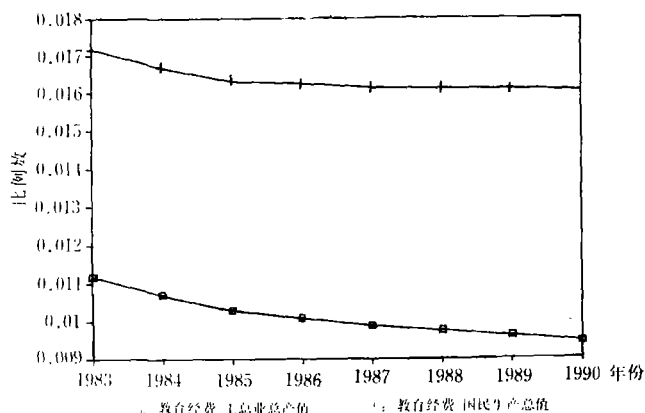


图2. 我国教育经费与工农业总产值  
及国民生产总值比较图

的办法,使其在中、高等教育方面保持较高的适龄人口入学率,1982年中学适龄人口入学率达到97%,大学适龄人口入学率达到58%。

第二种类型是加拿大、瑞典、日本、澳大利亚、联邦德国等工业化国家。它们的中、小学教育经费来源类似于美国,绝大多数中、小学生享受的也是一种基本免费的义务教育。所不同的,主要是高等教育的经费来源及对学生的资助办法。以1974-1975学年为例,美国大学生缴的学杂费占公立大学经费来源的12.8%,占私立大学经费来源的35.6%。但加拿大和西欧等工业化国家的高教经费不如美国那样多样化,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学生不必象美国大学生那样要付那么高的学

杂费。美国政府给学生的资助不仅用于在学期间的的生活、书籍等费用,还要用来缴学杂费。而加拿大等国政府给学生的资助则主要作为学生的生活及书籍费用。美国政府资助学生的形式较为多样化,有贷款、奖学金、工读(Work-Study)等。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贷款。加拿大、瑞典类似美国,也主要是贷款加奖学金。美、加、瑞三国对大学生的贷款不是一般市场上的贷款,它是一种由政府作保,任何有机会上大学的本国公民(适龄的或成年的)均可申请获得这类贷款。发放贷款的可以是银行、政府的专门机构或大学本身。贷款利率只有市场利率的1/2或2/3,利率的不足部分由政府承担。学生毕业后因无工作机会或死亡等原因无法偿还贷款的风险也由政府承担。回收贷款的期限在美国为5~10年,瑞士为15~20年。对大学生资助不同于上述三国的有下述两种情况:英国是给学生纯奖学金的形式,而日本是给学生纯贷款的形式。在这方面作长期研究的英国学者伍德霍尔(M. Woodhall)得出结论称,美、加、瑞三国的办法在效果上优于英国的办法和日本的办法。他所指的效果是:1. 贷款加奖学金比纯奖学金或纯贷款有较大的灵活性。2. 尽管这种贷款加奖学金的办法在平等权利问题上有争论——因为中产阶级比工人阶级更有机会、更愿意采取贷款方式使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他们可从政府给的贷款优惠中得到好处,但实际上,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受教育者也从高等教育中得到了好处。3. 这种方式虽在短期内看不出可以节省多少公用基金,但从长期看这种节省是可观的,而这些节省可以用

来扩展对更多社会成员的高等教育。除美国外,上述国家1982年小学适龄人口平均入学率近100%,中学适龄人口平均入学率为82.4%,大学适龄人口入学率为32.6%。有些发展中国家(例如哥伦比亚)已逐步采用这类贷款加奖学金的办法。

第三,免费高等教育。这种类型的国家有中国,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以及东欧、苏联等。这种类型的教育经费基本上靠国家拨款,其他来源只占极少的比例。由于人均GNP存在差异,各国对教育的投资也存在差异,因而这些国家完全免费高等教育所能惠及的人口百分数也存在很大差异。在有限的教育经费内,政府必须承担所有大学生的学费、房租、医疗费用,并给予一定的助学金。这种优惠1982年在我国只能惠及1%至2%<sup>①</sup>左右的适龄人口;而同年匈牙利高校适龄人口入学率已达到14%,因为匈牙利1983年人均GNP达2 150美元。在我国,1981年大学生数占各级各类学生总数的1.3%,中学生数占28.3%,小学生数占70.4%。而当年这些大学生所占教育经费竟达教育经费总数的20.01%。

第四,马拉维(Malawi)类型。马拉维是非洲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1983年其人均GNP只有210美元。从1972年到1980年该国教育经费的绝对值是逐年增加的,但教育经费占整个国家总行政开支的比重却从16.3%下降到11.3%。而且由于这九年间该国各级各类学生总数上升了60%,开支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教育费用实际上下降了。在1979-1980学年,该国小学生数占各类学生总数的97.4%,中学生数占2.4%,大学生数占0.2%。但是,小学教育只获得教育经费的40.3%,而大学教育却获得教育经费的23.2%。原因是,政府一直给大学生完全的优惠:不交学费,食宿免费,还给零用钱,有点类似我国的情况。1980年10月、11月,世界银行一个研究小组考察了马拉维的教育情况,推荐了一个“用者付钱(User Charge)”的建议给马拉维政府。所谓“用者付钱”即把政府兴办的教育与供水等福利项目同视为“设施”。由于政府经费有限,无法办更多这类“设施”,而要求使用这些“设施”的需求量又远远大于供给量。为解决这类供需矛盾,根据市场调节机制,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建议马拉维政府实行使用“设施”者付钱的办法。在实行这个办法时,他们还建议马拉维政府在大、中小学同时实行一项对贫穷家庭子女资助奖学的办法,这些贫穷家庭的子女一旦有了教育机会,将有效地改变其家庭及他们本人的收入状况,这就使教育也逐步成为缩小社会差别的途径之一。1982年4

月,马拉维政府采纳了这条“用者付钱”的建议,结果使1983年的教育经费比1982年增长20.9%。这些措施使该国各类学校(尤其是中学)入学率有了明显增加,并提高了教育投资效益,因为受教育者的家庭比以前更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中途辍学。

从上述四种主要教育经费筹集和使用类型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趋向这样一种模式:有条件的国家对中、小学逐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高等学校则采用多种经费来源的方式,来源之一是学生的学杂费,同时由政府作保对这些大学生发放教育贷款,并辅之以一定的奖学金。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大学生一般可以不受家庭经济条件的制约,就可享受高等教育。这些学生由于自己或家庭在高等教育上有了投资,他们也会有更高的学习责任感,国家和个人的教育投资效益将会更明显。另一方面,有些原来实行免费高等教育的国家(如马拉维)已从对大学生“全包”的重荷下得到解脱,国家得以有条件创办更多的中学和大学,可以吸收更多人接受中、高等教育。

### 关于在高教领域中如何充分利用教育投资的几点看法

据长期研究发展中国家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学者Psacharopoulos 1984年的研究报告,以均值而言,发展中国家的高教部门使用了各个国家教育投资的14.9%,但各国只有4.7%适龄人口受到高等教育。美国高教经费(包括政府经费和私人投资及学费等所有来源)占整个教育投资的比例,在1969-1970学年是35%,在1976-1977学年是37.5%,他们解决了当年45~50%高教适龄人口的入学问题。对比上述资料,我国高等教育的宏观投资效益问题就十分突出了。以我国各项事业较为顺当的“一五”期间和1982年为例,这两段时间里我国高教经费占用了整个教育经费的21%,但只有1%或2%的适龄人口受到高等教育。由此可见,我国高等教育的宏观投资效益不仅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说明,我国在提高高等教育适龄

<sup>①</sup> 世界银行在统计我国高校适龄人口入学率时,一般只统计我国全日制高校的在校生数。据我观察和对比,他们将美国二年制社区学院,全日制四年大学中的半工半读生(青年或成年人)也统计在美国适龄在校高校学生数内;依此类推,我国走大、职工大学、电大、夜大在校生数也应归入我国适龄在校高校生数之内。因此,1982年我国适龄人口入学率应是2%左右,而不是世界银行1985年发展报告上所载的1%。

人口入学率这个催化经济发展的因素上还是很有潜力可挖的。下述挖潜建议有的早已为其他专家提到过,此处仅是引用,复述和补充点个人看法。

第一、逐步提高师生比。我国高校的师生比按教委成立前的部颁标准是1:6或1:7,而实际上直至前几年不少高校的实际比值还只有一比二点几或1:3左右。美国、西欧、日本等工业化国家的一般高校,甚至一些研究生院,这个比值是在1:10至1:20之间。一般发展中国家高校的师生比也在1:7至1:15之间。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凭我国高校现有师资,就可以将现有大学的招生量扩展一倍至两倍,或多办一倍到两倍的大学。

第二、大力发展普通全日制以外类型的高校。据新华社最新报道,1986~1987年我国普通全日制高等学校已达1 054所,各种类型成人高校(电大、职大、农大、管理干部学院等)也已有1 420所,如果将我国近百所重点高校与美国70年代184所博士学位授予院校相比,将我国近千所普通全日制高校与美国的1 700多所一般综合大学、学士学位授予院校及专门院校相比,上述两档的层次、结构尚属基本合理。

我国1 420所非全日制成人大高校和美国的1 000多所二年制社区学院既有相似点,又有不同点。类似之处是,都位于两国高等教育的最低一个档次,学生成分以成年人为主,也有适龄青年。不同点是,我国这类成人高校有的学制长达三四年,学生大多是在职学习或半工半读。除自费走读不包分配的南京金陵大学这一类“走大”以外,基本上也享受一种免交学费的优惠。在教学质量上,以我的观察和对比,我国这类成人高校高于美国的二年制社区大学。美国二年制社区学院的学生成分较复杂,有成年人(如未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家庭妇女等),但更多的是来自低收入阶层的适龄青年,他们所修的课程大多为毕业后就能找到工作的应用课程,例如会计、秘书、小商业、计算机工程师、软件编写和应用等。其实,根据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布局,我国这个层次的高校应有我们自己的特色与规模,不必与其他国家等同。我国近些年来快速发展的这些非全日制成人大高校是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一个意义重大的发展和补充,是我国高等教育一支不可忽视的方面

军。特别是它们不具有我国全日制高校那种“全包”的性质,我国高教事业的发展,势将从这个方面取得突破。如能从下述几方面得到发展和帮助,它们将对我国培养更多中、高档科技人才作出更大贡献。首先,国家和重点高校、普通全日制高校应帮助他们提高师资质量,可以派送超编教师或新毕业的博、硕士生到这些院校任教,也可以让这些学校的教师定期就近到重点高校或其他全日制高校进修,参加科研。其次,由于这类院校将逐步发展为与地方经济建设、科技、教育、管理密切相关,能为地方培养、输送大专级技术人材的基地,因此省、市、县政府有义务为它们的基建、教学、科研承担主要的财政责任。其三、这些院校的学制和课程设置应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和特色紧密配合,招生制度、学费的高低、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完全可以有地方特色,不必全等同划一。

在制定、审批我国高校发展计划时,国家应有效地控制上述三个层次有比例的发展。正如国内不少专家早已指出的,层次不合理,造成宏观上的浪费比微观浪费更为惊人。

第三,设法逐步甩掉“大学办社会”的包袱。这个问题国内外不少专家已提出过建议。这里只补充一点,如果高等学校在地理上和人口比例上有个合理的布局,比如上述非全日制成人大高校或部分一般普通高校与地方需求逐步结合,那么全国有50%以上或更大比例的大学生能在居家所在地或亲朋所在地上学,或能在大学附近租到宿舍,则国家和院、校为大学生承担解决住宿问题的负担就可以逐步减轻。节省下来的投资就可以兴办更多更急需的院校或与教育有关的事业。

总之,教育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这应当成为我国各级管理、决策干部的明确观念。在教育投资问题上,必须有足够的远见和魄力,同时也必须有强烈的效益观念。任何短见,任何疏忽,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说到底对国家,对民族的未来,都将产生长期的危害性影响。从当前看,我国教育投资比例及高校投资效益至少不应低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在这方面,我们国家应该尽快采取实际的措施。可以说,这正是本文想一再表达的一个最低愿望。

### 本社直通电话号码变号

本社原用直通电话号码898682从1987年8月16日零时起改为8313553。原中继线8314447及各职能部分机号码不变。敬请注意!